

韓國青年萎縮的未來與歧異的議題

Shrinking Futures and Divergent Issues of Korean Youths

周銳澐*

Yunejong JOO

陳耀宗譯

Yauchong TAN

一、「三拋」與「土勺」：階級與漸趨萎縮的未來

韓國社會有許多新詞彙形容青年世代的絕望與挫折，例如「三拋世代」和「土勺」。面對挫折、對未來不抱希望的韓國青年創造了這些新的詞彙，來描述他們的處境。以「三拋世代」為例，那是指因為活在「地獄朝鮮」而被迫拋棄談戀愛、結婚和買房子念頭的青年世代。在外人眼中，韓國看來是一個繁榮富裕的國家，但為什麼韓國的青年世代卻普遍瀰漫著如此悲觀的情緒？

這跟韓國社會情境的改變息息相關。韓國人過去對教育的功能有著很大的迷思，認為教育能夠促成社會流動和機會平等。我們可以借用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概念，稱韓國為「隱性福利國家」（hidden welfare state）。韓國屬於那種根據教育程度和績效表現，而不是透過福利輸送系統來分配資源的社會。或許有人會論稱，所有現代民族國家都重視平等與再分配，但韓國與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在於，它是透過對教育的狂熱追求和塑造精英理想，來實現平等與再分配的目的。「少河龍夢」的故事

投稿日期：2020年1月14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15日。

* 周銳澐，首爾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現任研究員。

聯絡方式：arabyjoo@gmail.com。

就充分體現了韓國人追求進入精英階層的重要建構與敘事（Joo 2017）。

一如台灣，韓國之所以在經濟上取得快速發展，有人認為是因為教育程度高，資源分配也相對均勻。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指出，在某種程度上，東亞國家的發展奇蹟是二戰後由土地改革所促成的，而經由教育達致的資源平均分配和社會流動則扮演了「隱性福利國家」的功能。然而，這樣的敘事、夢想和現實，已隨著「土勺」論述的興起而快速消逝。關於社會流動的代表性夢想如此翻轉不變，意味著社會、社會關係和人的心態發生了深層的結構性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將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和不會有過的作用。我們必須在這樣的脈絡下來理解青年世代所遭遇的問題與挫折。

所以說，儘管韓國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社會保障措施，過去人們依然相信「開川龍夢」，對未來懷抱夢想，並致力追求更美好的未來。然而，當今韓國從三、四年前開始，興起了「三拋世代」論述和以「金、銀、銅、土勺」分類為本的「土勺世代」論述。

「土勺」一詞是指由於家庭收入不足，無法從父母那裡獲得經濟支援的年輕人。2015年，「金勺」一詞在韓國社會流行起來，用以指稱那些從父母那裡繼承「財富」的優勢階級。類似的新詞彙被創造出來，意在顯示韓國社會逐漸加劇的不平等狀況。舉例來說，著名的韓國流行樂團防彈少年團（BTS），就經常自詡代表土勺世代的絕望與挫折：

〈不再有夢〉（No More Dream）

防彈少年團

讓人厭煩的每一天，日復一日
 大人和父母一直灌輸我們刻板的夢想
 未來職業首選是……公務員？
 這不是強求的夢想嗎？讓救援投手出場
 紿浪費著時間的課後溫習投個快速球
 反抗這地獄般的社會吧，拒絕那樣的夢想
 問問自己吧，你夢想的剖面圖
 逃離受壓迫的人生，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

獻給所有無夢的少年

為了了解韓國青年的這種心態，我訪問了一些年輕人，尤其是透過努力與教育取得優勢地位的國立首爾大學青年學生。金勺青年和土勺青年都真心相信個人努力與能力的作用。不過，在入讀首爾大學之後，這些聰慧的年輕人便開始意識到金勺和土勺之間的顯著差異。由此可見，大學並未提供更寬廣的想像或人生選擇，反而展示了赤裸裸的階級鴻溝。土勺青年不止在物質上，也情感上遭遇諸多障礙。下面是幾位受訪者所描述的他們的故事。

因為我從高中時期開始就離家在外居住，每當我回家時看到家鄉的小巷，我就會擔心「憑自己的能力逃離這裡是不可能的事。」在我19、20歲還不太懂事的時候，我還會相信自己終有一天會離開這裡，去過另一種生活。進到社會，你必須應付各種各樣的挫折。但在許多情況下，我不得不放棄，並且因不確定自己能否克服困難而對未來感到懷疑。（一名男學生）

敏哲有過自殺的念頭，因為他想到自己無論多麼用心競爭、多麼努力，他的社會地位終究不會改變。

「我必須不斷地跟別人競爭，但經濟始終不好。即使我嘗試挑戰自己，也總是會覺得，因為父母經濟背景的緣故，我將會一直留在這個階層。我想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生活看來是那麼困難，乾脆早點了結算了。」（另一名男學生）

我發現，在不平等的再生產過程中，年青人流動性和能動性的下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首爾大學年青學生的敘事與經驗做的分析揭示，這些青年的社會流動性面對各種界限，他們在未來取向上「所」採取的是視野狹隘、安全為重，而不是開放、冒險進取的策略。這現象與他們父母教養他們的過程及在這過程中養成的能力與技能有著密切的關係。以金勺青年來說，他們在父母教養過程中獲得了各種經驗，包括面對世界的各種經驗，所以他們在嘗試拓展視野和追求社會流動時相對較為輕鬆。社會流動的差異可從教養、能力和未來取向的角度來解釋。在金勺家庭裡，父母是孩子的導師兼顧問。相對而言，土勺青年的父母缺乏資訊、人際網絡和知識，他們甚至因為本身在社會上就處於邊緣、不穩定的位置，而無法給予子女情感上的支持。因此，土勺青年的選擇是有限的，這導致他們只能做

出簡單的未來規畫，追求的只是安穩的未來，例如去當公務員或老師。反之，金勺青年會去探尋更具冒險性的未來，並追求海外經驗與教育。

土勺青年之所以遭遇諸多限制，是因為他們缺乏海外經驗和語言能力。土勺青年只能說韓式英語，他們說英語純粹為了應付語言能力測驗；金勺青年則能夠說標準英語，以英語溝通，並具備身處多語情境的經驗。因此，在選課、求學經驗（包括出國參加短期課程、寄宿暑期課程等）和未來取向上，土勺青年會縮減他們的選項和縮小他們的世界，只求有個安穩的未來。

我發現，韓國社會的不平等正在以不僅僅是經濟資本的形式，而且是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形式，甚至是人生未來取向的形式，被複製和自然化。隨著可能性的萎縮和不安全感的加劇，儘管韓國在經濟和民主發展上取得顯著的成就，青年人反而變得更加悲觀。

二、世代衝突：既得勢力與圈外人

青年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世代衝突。韓國社會的民主轉型是相對成功的，儘管如此，後民主轉型時期的韓國仍面對許多問題，而這項新的危機與一些青年問題密切相關，其中包括反自由青年的興起和性別衝突。在當今韓國，有人說青年的價值觀更加保守，有著更強烈的反自由態度，青年群體中的性別衝突也更加激烈。

不過，我們可以借用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既得勢力與圈外人》（*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一書的理論，來探討韓國的青年問題（Elias and Scotson 1994）。埃利亞斯在書中檢視了英國某小鎮原住民與移民群體的關係，並將兩者區分為「既得勢力」與「圈外人」來分析。既得勢力一般較為統一，也掌握較大的權力，而「圈外人」在很多層面上則缺乏動員能力、信心和權力。圈外人被認為是次等的，處於邊緣的位置。在埃利亞斯的分析基礎上，本文發現，韓國青年將自己視為圈外人，他們缺

乏做決定和改變個人命運的力量，並且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

舉例來說，上一代青年和當代青年之間在象徵再現（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上存在著矛盾。上一代青年指的是1980年代的大學生，他們是當年韓國民主運動的主角，如今年逾五十，不再是生理上的青年，但他們仍舊想要時時保持作為象徵性權力的青年形象，同時牢牢掌握實際的權力與保障。因此，上一代青年和當代青年不僅在權力、資源分配和階層上彼此疏離，在關於青年的能指（signifier）方面也相互對立。媒體經常認為當代青年在社會轉型方面缺乏能量與遠見，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將當代青年放在較為次等和邊緣的位置。甚至在社會運動領域，青年也是去政治化和分裂的群體。

經濟方面也存在世代衝突。在我關於某小鎮青年的研究中，我發現年輕人對這樣的世代衝突多有抱怨。當地一名男性青年指出：「大多數年輕人都是租戶。由於父母沒有房子，我要做生意的話就必須租房。」如果他們不想住在家裡，或是想要創業，就必須租房和繳付房租。而大多數的地主或屋主是老一輩的人，他們從脆弱的年輕人手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例如在那個小鎮的大學城附近，有許多供年輕學生租住的個人房間。那些屋主透過一個緊密的網絡，將房租定在特定的水平，從而確保自身的利益得到保障，儘管當地的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年輕學生卻被迫支付高昂的房租。因此，處於既得勢力網絡之外的年輕人深感脆弱和貧困，屋主也不願意降低房租。在年輕租戶（不論是學生或是創業者）和屋主之間存在著某種鴻溝。再者，就小鎮的情況而言，年輕創業者必須致力為鎮上那些小而簡陋的街道創生價值，並且透過文化規畫與設計來活化小鎮，讓小鎮恢復魅力。但在這過程中，屋主會從那些年輕創業者和文化設計者的工作中收刮利益，而後者在投注了大量精力與熱情之後，卻又必須承受當地仕紳化的苦果。

年輕人生存和生活在當地的最大障礙不是集中化的社會分層，而在於當地的封閉式人際關係與網絡不接受他們的創意與新文化。年輕人面對諸多困難不僅僅是因為無情的、市場導向的新自由主義，還因為當地欠缺或

多或少需要以平等、開放和自由為基礎的契約關係。當地由舊世代組成的封閉式利益集團將年輕人排擠為圈外人，在重大社會決策與地方資源分配過程中將他們排除在外。而年輕人則希望能夠被肯認為舊世代的平等夥伴或公民，並對現實做出改變。

三、青年與性別的交集：韓國的新女性主義運動¹

最後，青年與性別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交集。在韓國，性別相關的社會運動頗為強大。儘管大多數年輕人或多或少有去政治化的傾向，但年輕女性主義者亦致力於發動群衆大會和示威活動來表達心聲。對此，屬於舊世代既得勢力的團體會有共鳴，覺得在社會轉型議題上與這些女性主義者有著相似的語言和抗爭劇碼。既得勢力團體對年輕女性主義團體的支持，造成青年團體之間出現性別上的衝突。有別於獲得既得勢力團體支持的女性青年，男性青年因為在社會轉型議程上與既得勢力團體缺乏共同的語言和框架，所以會覺得不得其所及被邊緣化。

在韓國，近年最重要及大規模的街頭運動，是2016年的一系列燭光集會。但是，在這次示威運動中，青年人並未組織系統的活動，或發出代表性的聲音。當今韓國青年運動中能見度最高的成就，反而是所謂的「新女性主義運動」。這項運動主要是由年輕女性組織，她們積極參與那些示威活動，針對性別相關犯罪和韓國墮胎法的議題發聲。如前所述，其他東亞國家的青年運動所針對的是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關注諸如和平與民主、新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等主題，並且為另類視角而奮鬥。但在韓國，聚焦於性別暴力、強調性別與青年之交集的性別化運動，在青年行動主義（youth activism）中占據中心的位置。民主與和平等宏觀視野的缺席，可能是因為韓國近年已經歷過相對和平的民主化過程和政權更替。換句話說，在韓國，人們沒有必要再對抗執政黨或要求激進的社會改革。

¹ 參見周銳澐（Yunjeong Joo 2018）。本節是這篇論文的精簡版。

在韓國的街頭運動中，學生運動也留下了頗為豐富的遺產。不過，當今青年世代和舊世代的學生運動之間存在明顯的代溝。新女性主義運動是由各種女性所組成，其中不僅有大學生，也有其他背景大不相同的女性。所以，這是一個多元的運動，而不僅僅局限於「校園行動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韓國在經歷過燭光集會之後，各階層人民對各種抗爭方式已經習以為常。年輕女性不再害怕街頭抗爭，而且目前的政治環境也對示威者較為友善。因此，由於和平示威的文化已經成功帶來政權更替，各種不同的團體開始透過街頭示威的方式來發聲，抗爭手法和劇碼也變得更加民主化，適合社會各階層人士參與。

在某種程度上，新女性主義運動在組織和活動劇目上與粉絲文化很相似。這個運動最初只是梨花女子大學（Ewha Woman's University）學生爭取平權的示威活動，但隨後擴大至針對公廁或試衣間裝設針孔攝影機偷拍女性的犯罪行為（韓語稱為「몰카molka」）和爭取廢除反墮胎法的抗爭。參與抗爭者以年輕女性為主，並經由推特、臉書、網咖、井號標籤（hashtag）等媒介動員起來。也有著名藝人參與集會，或透過社群網路服務（SNS）表達支持。抗議活動進行時，她們會採用特定的字眼或詞彙，以提高其於推特或互聯網的關鍵字搜尋率。她們透過「不舒服的勇氣」（uncomfortable courage）這個井號標籤，提高了這場運動的網路曝光率。「不舒服的勇氣」運動者也製作許多網路漫畫（webtoon）和實行多種媒體策略，並經常以社群網路服務為媒介，將觸角伸到更廣大的群眾，甚至包括初中和高中生。

曾參與這些示威活動的一名高中女生聲稱，這些示威活動讓她覺得充滿力量。總體而言，這些示威活動讓那些面對激烈社會競爭和自信心不足的年輕女性有機會向社會表達心聲，同時抗拒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訴諸高昂口號和激烈行為的傾向。這項女性運動強調女性必須擺脫男性中心觀點；它忠於女性主義的立場，而不跟隨商業時尚或潮流文化。另外，在運動過程中，女性和男性在政治態度與認同方面的衝突也上升了，韓國青年如今因為性別政治的差異而嚴重分化。

四、結語

當今韓國社會面對資本主義全球轉型與地緣政治所誘發的各種新挑戰和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青年世代在這些巨變中首當其衝。韓國青年遭遇的挑戰與挫折，是宏觀社會結構轉型的結果。然而，青年是在幾乎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曝露在這些巨變中，因此他們在許多方面，包括生計、安全與情感，都十分脆弱。而且，隨著韓國的不平等狀況日益加劇，過去開放給年輕人的許多機會，如今明顯地漸趨萎縮，變得愈來愈封閉。如此漸趨萎縮的未來也經由媒體的再現，例如韓劇經常演繹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鮮明對比，以及不時爆發的知名政治人物裙帶關係或其子女透過走後門獲得大學或企業錄取的政治醜聞，而變得愈可感知。除了教育與就業機會方面的異常激烈競爭等原有的困難之外，統治精英偽善，公平正義不彰，更令許多韓國青年倍感挫折。更糟糕的是，許多社會部門，例如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學術界，都未給予青年平等的待遇。在此嚴峻的情況下，年輕人唯有透過行動和政治動員，才有可能看見一絲希望和改變。為了讓自己被看見和讓自己的心聲被聽到，韓國青年在各種社會運動、社區發展和社會部門中致力參與和付出努力，但我從中看到的只是有點黯淡的可能性。

引用書目

- Elias, Norbert, and John L. Scotson. 1994.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London: Sage.
- Joo, Yunjeong. 2016. “Korean Family’s Narratives: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Dream of the Flying Drag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Korean Studies* 3(1-2): 197-220.
- Joo, Yunjeong. 2018. “Same Despair but Different Hope,” *Journal of Asian Sociology* 47(3): 401-421.